

期刊·观察

马年春晚“年夜饭”有新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万马奔腾……在众多的马年吉祥语中，马年春节在无数的家庭和场景中，以不同的方式展开。而“春晚”依然是热度最高的话题。

2026央视马年春晚的主题为“骏马奔腾”。在世界上，至少生活着150万种生物，而马无疑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动物之一，在蒸汽动力广泛应用之前，任何一个发达的人类文明都得益于马带来的强大推动力。正如《新周刊》盘点：人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和马一起共同创造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与马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自强不

息”“齐头并进”等精神内核则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央视在内的马年春晚这道国人的“年夜饭”，同样也更新了“味道”。

春晚的科技感十足。对许多家庭而言，这或许是第一个能清晰感受到“AI含量”的春节。在内容创作上，各路“活人感”十足的机器人争奇斗艳，从仿生陪伴到打拳舞剑，从洗衣服讲笑话到盘核桃递水瓶——央视马年春晚让人类看到了AI智能的无限可能。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国产AI至少深度参与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河南卫视四大马年春节晚会的节目；在小品里，它是帮角色点外

卖的“生活小助理”；在博物馆场景中，它是为孩子娓娓道来的“历史讲解员”；在魔术环节，它是与魔术师默契配合的“虚拟搭档”；在相声舞台上，它甚至成了能接梗、会“顶嘴”的捧哏演员……从整体设计、舞美构思、文本生成到创意策划，乃至在不同节目中扮演角色，AI以近乎“万能”的姿态，重塑了观众对AI的认知，而AI也悄然重塑着中国人的过年方式以及生活日常。

春晚的互动感加强。互联网3.0时代的一大标志是“互动”，央视马年春晚做到了两个互动：首先和短视频平台“互动”，首度将手机纳入舞台主镜头阵列，

数亿双眼睛通过屏幕看到由手机直播的主舞台画面，方寸屏幕里，开场舞红绸的每一次抖动、主持人眼角的笑意、舞台灯光的每一次流转，都显得清晰与亲切。这意味着平日揣在兜里、用来刷视频的通讯工具，已经拥有了足以承载国家级审美与严苛技术标准的底气；其次是和观众互动，具体表现在和B站合作，开放了真正的“弹幕”。

在弹幕里，网友纷纷接龙“祝xxxx新年快乐”，发出各式各样的祝福语，兴奋地说“妈妈我上电视了”，一派热闹景象。据了解，B站春晚直播间的弹幕总数达到1.33亿条，平均每秒发送7700条。“实时的弹幕互动，将观众的反馈变成了晚会的‘第二舞台’，让每一个

网友都能成为除夕夜的‘共创者’。这正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精彩之处，即，呈现观众想看的、道出观众想说的、传递观众所愿的。”《南风窗》评价，回顾春节联欢晚会四十三年的历史，这是央视官方首次正式引入网友实时弹幕，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往年被评价“不够接地气”的春晚，展现出了更亲民的姿态。

事实上近些年来，春晚逐渐成为前沿科技与艺术美学融合创新的平台。央视马年春晚还没结束，#十二花神好看#的话题已经登上热搜。十二种花开花月份不同、十二

花神故事背景也不同，短时间内完成十二重时空转场难度不小——但节目依旧实现了“在演播厅内完成”的目标。关键点在于科技：对演播室进行三维建模；通过AR在镜头前“贴片”，将视觉效果覆盖于真实场景之上；创新采用AI实景拓展技术，让演播厅里真正实现漫天缤纷。同样火热的歌曲《立春》，则以“万物复苏”为基调，刺绣、编织技艺等非遗元素融入服饰，浅粉色礼服搭配翠绿舞美，“人间向暖草木发”。中国传统美学，正在科技的赋能下一次次“火出圈”。

■文史期刊

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2月上,半月刊

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二十四节气”专题,通过钩沉其源流、剖析其应用,认为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一部农业科技史,堪称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2016年11月,二十四节气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官方定义为: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它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是蕴含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古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叙事主线。

对任何一个文明而言,对时间和空间的测定和规划是首要之事;对农耕文明而言,时间的测定和管理更是农耕民族的生死立命,农时一误,收成即无,生存便是问题,故“为治莫大于明时,明时莫先于观象”,“观象授时”关乎农业文明根本。华夏先民在四时流转、节序交替中仰望星空,俯瞰大地,在漫长农耕实践中凝练出一套独特的时间坐标——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的本质是时间,将天文时间转化为气候时间,即把“天上的”时间转化为“地上的”时间,最终从“天文之学”落地为“人文之学”;其核心是“道法自然”“顺天应时”,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中,作息存养。

二十四节气的萌芽与成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最早被测定和确立的是“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和秋分),这是一个回归年中最重要四个特征点;白昼最长日、白昼最短日和昼夜均分日;先秦时期确立了“八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以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二十四节气的序列(包括完整的数目,称谓、次序)确立;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发《太初历》,二十四节气正式进入国家历法。从立春的万物萌动到冬至的蓄力待发,二十四节气为



农业社会运转划定了严格规律,如同精密齿轮,驱动着农耕、养殖、蚕桑、纺织、茶糖、染料等产业协同运转,成为中华农业文明可持续性的深层密码。

杂志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一一揭示了蕴含其中的古代农业科技光芒与生态观念:立春时节,昼消夜冻、万物未生,汉代的农人采用代田法实现了防风保墒的目的;雨水时节,坡塘、塘浦圩田等水利系统有效利用降水,诞生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便是无坝引水工程的典范;惊蛰震动,铁犁铧与“耕一耙一耱”体系带来耕作的革命性提速;春分是春耕、春种、春管的关键时期,大地上的农事按下“快捷键”;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浸种催芽”与移秧技术使稻麦复种成为可能,土地利用效率倍增……冬至的主表测定制定方法,体现了科学实证精神;大寒节气是先民积肥备耕的黄金时期,体现了先民们“种养结合”的循环思想。大寒让此时既是二十四节气轮回的终点,也悄然站在新的起点。

正如杂志所言,二十四节气蕴含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绝非零散的技术堆砌,而是一个根植于自然节律、统筹水土资源、整合人力畜力的复合型生产体系,不仅塑造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独特气质,也为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与智慧源泉。

■读书期刊

唐传奇中的“男女”与“江湖”

《书城》2026年2月号,月刊

王国维先生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点:“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多数时候,唐代文学直接指向诗歌,但唐传奇也是中国小说史上不可忽略的存在。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刊发李庆西先生文章,从唐传奇的两大文学主题“男女”和“江湖”入手,揭示唐传奇之“奇”。

李庆西先生曾在文学评论文集《话语之径》中,将中国小说源流梳理为二:一者为笔记体,自魏晋笔记(如《搜神记》)、六朝志怪初呈形状,至唐人传奇已臻成熟,宋代《醉翁谈录》、明代《剪灯新语》以及清朝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著作皆体现了笔记体的发展脉络;一者为说话体,“说话”便是说故事,由宋人的“说话”发展而来,后来成为民间艺人的专门营生,由此直接产生了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以及元明以后的章回体小说。从差异上看,笔记体小说的作者主体是文人士大夫,其中对人情世态的记录,包含着文人的修养与自我确认,凝聚着深刻的人生体验;说话体小说源自民间艺术土壤,讲究情节铺排、细节描写、戏剧冲突、伦理说教等。

从时间上看,笔记体小说在前,说话体小说在后。作者认为,唐传奇是中国小说真正的源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以说教为要旨,心念略无羁绊,便是逞意想象与情感表达。作者从唐传奇的文学主题入手以作说明。

文章写道,唐传奇多取材于当世之事,从中可以看出唐代士人已经善于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民间传说中采撷素材。除去志怪元素外,唐传奇主要有两大文学主题:一是借男女爱情叙述女性奇事;二是以隐者与侠客演绎江湖之道。换言之,传奇之“奇”,在于“男女”和“江湖”。

作者发现,唐传奇故事中的女子,基



本上不取普通女子,而是身份比较特殊的姬妾、后妃、神女(或狐魅)。原因无他,因为时代环境,普通女子不能踏入社会,故而缺乏社会性故事。事实上,唐传奇的男女故事都是由男方切入话头,呈现的是男方的叙述视角。然而故事的转折却往往是由女方主导。到头来,女性的特殊身份总会显出一种超凡力量。比如,《李娃传》刻画了一个以爱情重建人生的勇敢女子,传达了女性命运系于自身的选择与奋斗的理念;《霍小玉传》说的是“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但阻碍两人爱情的,是两人的身份以及背后的整个门阀制度。

中唐以至晚唐五代,传奇文数量大增,这一时期的作品往往涉猎江湖人物之隐迹行踪。作者发现,唐传奇的写法基本上是“一个人的江湖”,是隐者的世界、独行侠的个人幽径,而非《水浒传》和后世武侠小说那种地下网络或是成规模的啸聚山林。为什么总是个体行为?可由两面观之:以侠犯禁,恩怨快意,实乃个性抒发,亦自有伦理的合法性,但这种叙述有其自我约束。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是,传奇文中的“男女”与“江湖”两端实有相当的重叠,因为出现了女侠的角色,比如众所周知的聂隐娘、红拂等。

作者认为,从“男女”到“江湖”,扫除了许多羁绊,开辟了演绎个性生长的新路径,这里有着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

■文学期刊

呈现作家主观视角里的家乡

《民族文学》2026年2月号,月刊

《民族文学》开设的“新大众文艺”栏目,通过地方推荐和杂志社发掘双轮驱动,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基层作家的扶持力度,让民族文学之花愈发绚烂。栏目最新一期刊发藏族青年作家,在读大学生四郎彭措的中篇小说《流动的定曲河》。

“曲珍阿姐一个月后结婚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我们的定曲乡。一时间这个消息成为我们定曲乡的热门话题。”小说如是开篇,两个家庭为此一喜一悲:喜的是去县城采购结婚用品的朗卡家,悲的是曲珍阿姐曾经的情人、隔壁村的贡嘎。小说的叙述者“我”,是朗卡家的近亲,也是一个比曲珍阿姐小九岁的孩子,事情前因后果的知情人。小说一开始设置了一个悬念:贡嘎与曲珍阿姐这“定曲乡大多数人看好的一对”,符合定曲乡习俗的情侣,为何“硬生生地被拆散了”?

小说分为十一章,其中奇数章节用“我”也是“第一人称”叙述,偶数章节改“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是亲历视角,所感所见所思所想,皆出自于“我”,亲切而真实。第三人称可以弥补第一人称视角的不足,把“我”没有“看见”、无法“知道”的全盘托出,还可以深入人物内心,揭示其中的幽微。一个中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相互配合,讲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时段,显示出小说叙述的强大力量和无中生有的能力。两者因果关联、相互参照、相互推动,完成一个大的叙述:曲珍、贡嘎、贡嘎分飞,虽事出有因,却与他们自身无关。命运弄人,却神秘莫测,荒诞无常。而定曲河在小说中不仅是地理场景,更像是一位见证者,贯穿了生死、悲欢、轮回。

作家通过细腻的文学表达,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捕捉那些藏在眼神里、话语间的细微情感,向读者呈现出作家个人主观视角里的家乡,一个带着记忆、情感、温度的定曲乡。

徒骇河的文学书写

《中国作家·文学版》2026年第2期,月刊

最新一期《中国作家·文学版》杂志“实力作家小辑”,刊发作家郑欣的中篇小说《徒骇河》。《徒骇河》的体量为长篇小说,此次是以节选形式发表。

在现实中,徒骇河是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流,《尔雅·释水》记载为中国古代大禹治水时疏浚的九河之一,其来历可追溯至大禹治水时期。据《拾遗记》等古籍记载,大禹治理此河时突遇暴雨,助手(古称“徒众”)因洪水汹涌而惊骇,故得名“徒骇河”,该河历经商河、土河等历史演变,最终形成现在的河道。同名小说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徒骇河包裹着的故乡水城为背景,以因年龄过小被拒绝上小学的“我”为视角,描绘了水城中居民的日常生活,刻画出生息各异、普通人群像,人物生活的细节与情感波动交织,用乡愁氤氲时代的烟火气,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人文画卷。

作家以白描式的手法,采用多线交织的方式将故事的起承转合聚焦于人物,以娓娓道来的语气阐述多个人物的生活轨迹及他们在历史洪流中的不同命运,以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生活冲突与理想追求,反映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中的面貌。

作品注重将时代背景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徒骇河不仅是地理符号,更是历史的象征,被徒骇河所环绕的水城象征着在历史洪流中被推着走的人们,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展现出人性复杂与情感深度的同时,也表达出对未来的期许与对过去的反思。

年夜饭是国人最具仪式感的晚餐

《文史知识》2026年2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文史知识》刊发辽宁大学民俗学学者邵凤丽《年夜饭的礼俗传统》一文,认为对国人而言,年夜饭是一年之中最具仪式感的晚餐,承载着厚重的亲情伦理与绵长的历史记忆。

“年夜饭”之“年”在天文学的本质,是一个太阳回归的周期,一年即一个“回归年”。古代先民基于对自然时序与年度循环的观察和理解,给出了不同的名称,《尔雅》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年”则是新旧交替的标志性日期,古人称之为“岁末”“岁首”,中国古代的岁首并不完全一致,且经历了从夏正(正月)、商正(十二月)、周正(十一月)、秦正(十月),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定型并沿用为“正月”的过程。今天所说的“春节”,其日期基础正是自汉武帝《太初历》确立的“以正月为岁首”的传统。

据作者考证,“年夜饭”这一名称始现于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载:“除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语,名曰‘年夜饭’,俗呼‘合家欢’。”“年”的内涵根植于农耕文明,其甲骨文字形为“人负禾”,意为收成;《说文解字》亦释为“谷熟”,进一步明确了“年”与农业丰收的关联。丰收之后,古人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与庆贺仪式,感谢神灵,祈愿来年。先秦时期,岁终的“大雩”与“腊祭”可视作年夜饭礼俗的早期形态;到了汉代,每



逢新年之际,朝廷举行盛大朝会,民间则洒扫庭除、祭祖拜贺;唐宋时期,随着城市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年夜饭礼俗呈现出世俗化倾向。食材种类日益多元,鱼、禽、时蔬、水果等皆成为节日常饕;明清时期,年夜饭礼俗的基本框架已趋于成熟——更换春联门神以驱邪纳福,祭祀祖先以敬宗追远,仪式礼成后,家人团聚宴饮,围炉守岁、共话家常,期盼新的一年人寿年丰。

文章认为,年夜饭作为除夕日礼俗序列的关键构成,其本质远非一顿普通的家庭聚餐,而是深度融入“辞旧迎新”时间节律的核心礼仪实践,严格遵循着自古延续的仪式链条。从时序上看,年夜饭并非孤立的饮食活动,而是承接祭祀、开启守岁的中枢节点,串联起除夕一日的完整礼俗流程。

反思AI时代的“人类能力增强”观

《读书》2026年2月号,月刊

AI时代大势所趋,世人基于对AI技术发展后果的预判,大概持悲观主义、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多基于大规模失业威胁、失控风险与安全危机、伦理与人性侵蚀、权力垄断与监控;乐观主义多基于生产力革命与新就业、增强人类能力。技术乐观主义者一方面拼命发展人工智能,另一方面则努力提高自身的身体能力,人类增强计划被推崇者们视为一种“更好”,例如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就力图让全人类与AI集成,通过增强计划让人类在面对技术发展奇点时,仍能保持竞争力。最新一期《读书》期刊刊发法律学者罗翔的文章,对AI时代的“人类能力增强”观予以反思。

所谓“人类能力增强”,作者的理解是通过运用生物学、医学、神经科学、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克服人体局限、提升人类身体能力和智力能力的尝试。出于被AI取代的恐惧,人们希望通过人类增强计划,借助生物医学的干预来造就更好的人。

作者注意到,早在2013年,德国哲学家迈克尔·豪斯凯勒在出版的“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一书中,对形形色色的人类增强计划进行了分析:一是在健康状态下对生命的延长,二是认知能力



的提升,三是情感的增强。但豪斯凯勒对此提出了质疑:无限制地延长生命,没有人愿意生孩子,资源被老人长久占据,新人永远没有机会。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共同体而言,没有死亡,不一定是件好事;认知增强是通过操纵大脑来改善人类知识状况的干预措施,它会导致认知的错乱;情感增强是提高控制情绪的能力,但一种完全可以掌控的情感不再是情感,如果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忧伤与喜悦,这种情感其实是一种自我捏造,它无法与外在的客观事物相联系。

正如本文所评论的,人类能力增强计划的本质是人类试图对一切加以掌控,“我命由我不由天”。但其实“认识你自己”,感恩被赐予的一切,才能真正通往人类幸福的归宿。



郑欣,《徒骇河》,《中国作家·文学版》2026年第2期